

## 軸心時代與中國思想的特點

張廣保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 摘要

中國文明是與儒、釋、道等三支為基幹支撐起來的，他們共同構築起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系統。儒釋道三教各有擅長，他們互相補充，長期以來對傳統社會廣泛滲透，對中國古代歷史同時產生深刻影響。如果說世界上其它幾種主要文明象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只是一種單一宗教文明(在這一點上，印度文明似乎是個例外，它儘管與印度教為基幹，但同時其它宗教象耆那教、錫克教、伊斯蘭教等，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中華文明就是以儒、釋、道互補為基本特徵的複合結構。三足鼎立，其支撐更牢固。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解釋中國古代社會為什麼具有超強的穩定性及延續性的原因所在。此外，與現存世界上其它主要文明相比，中國文明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特徵，此即以此世的、人文的關懷為中心。這与其它文明奠基於神性中心形成鮮明比照。

與世界上其它文明的軸心時代不同，中華文化在其軸心時代之前還有一個經典時代。中國經典時代的經書主要由夏、商、周三代的政典、禮典及史傳構成，其中的人文色彩特別濃厚，主要討論現實世界的政治、道德問題。這與古希臘文明史詩時代的史詩完全不同。中外經典構成的這一差異直接影響到各自軸心時代思想突破的進路及此後文明演進的途徑。与其它民族軸心時代因思想突破而引發的文明傳統由神性傳統向人文傳統之轉向有所不同，中國軸心時代的思想突破顯得更為溫和，其與傳統之間維持著頑強的延續性。

關鍵字：三教，人類，古典時期，軸心時代

## **The New Axial Age and the Characters of Chinese Thought**

**Author:**

Zhang Guangbao,  
Professor,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Add.:**

Peking University, No. 5 Yiheyua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 R. China 100871

**E-mail:**guangbaoz@aliyun.com

**Abstract:**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re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is is a special kind of ternary composite structure of civiliz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counterpart. It is noticed that there is a Classical Age before the Axial Ag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classics generating from the Chinese Classical Age focus on the humanity, whereas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vinity. The characters focusing on the humanity orients the path of Chinese thought, which suppor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 Three teachings, the humanity, the Classical Age, the Axial Age

## 軸心時代與中國思想的特點

張廣保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1883-1969）在總結了古希臘、以色列、印度、波斯及中國文明發展的歷史後，創造性地提出了“軸心時代”這一重要概念，用以解釋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他說：“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他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後，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或曰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力量。”<sup>1</sup>對於中國生活於軸心時代的思想家，他特別舉出孔子與老子。不過我們注意到與世界上其它各大古老民族例如古希臘、希伯來、印度不同，從中國文明發展的實際歷史看，在軸心時代之前中國文明還有一個經典時代。誠然，在軸心時代之前，世界其它文明古國也都曾產生自己的經典，像古希臘的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奧德賽》，猶太民族的《舊約全書》，波斯的《吉爾伽美什》及印度的四《吠陀》等，然而這些民族在前軸心時代產生的經典與中國的經書相比，都屬於神話或宗教聖典，關注的核心問題是解脫或救贖的問題。而中國的經書則主要由夏、商、周三代的政典、禮典及史傳構成，其中的人文色彩特別濃厚，主要討論現實世界的政治、道德問題。之所以有這種差異，我認為與中國文明的早熟有直接關係。因為根據《國語》的記載，早在五帝時顓頊時代，經由“絕地天通”，中國文化就完成了由神性傳統向人文傳統的重大轉向，從而確立了德性傳統。中外經典構成的這一差異直接影響到各自軸心時代思想突破的進路及此後文明演進的途徑。與其它民族軸心時代因思想突破而引發的文明傳統由神性傳統向人文傳統之轉向有所不同，中國軸心時代的思想突破顯得更為溫和，其與傳統之間維持著頑強的延續性。這當然是因為中國文明的這種轉向早在經典時代之前就已完成。

### 一、經典時代與軸心時代

在中國軸心時代的思想家雖然也有像道家學派的老子那樣，對傳統的仁義禮樂價值體系進行犀利的批判和再詮釋，但諸子百家中更多的卻是像孔子那樣述而不作，對傳統更偏重於傳承。因此，從世界文明的大視野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發展似可區分為三個較大的歷史時段，它們分別是：經典時代（或原典時代）、軸心時代、復興時代。

<sup>1</sup> 卡爾雅斯貝爾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魏楚雄、俞新天譯，華夏出版社 1989 年，第 14 頁。

## 1、 更新再始——中國軸心時代思想的特點

經典時代文化創造的成就主要體現在諸種經書中，它們支配著中國政治、社會生活達二千五百年以上。直至今日，仍然對我們社會生活產生深刻影響。表面上看來，經書中的《尚書》、《易經》、《詩經》、不過是夏、商、周三代有關政治、宗教、文學文獻的彙編，其中似乎沒有包含什麼深刻的思想。然而，五經之所以被尊為經，並不是純粹因為它們出世年代的古老，而是由於它們承載著我們這個民族深層的政治文化理念，此亦即先秦諸家所指的“先王之道”。經書之所以被抬到經的位置，完全是因為它們承載著根本的、至上的大道。自春秋戰國始，一代代儒家學者之所以沉醉於注經明經活動，目的也是為了彰明、傳續先王之道。按照儒家學者的理解，經典時代實際上是道化流行的黃金時代。在這一時代中，先王之道完全顯現於現實的時間、空間之中。因此，在這一時代不容易發生對道本身的追詢。隨著經典時代的結束，道也隨之退隱於後。道之退隱也就意味“學”的出現。因此，旨在以辨彰先王之道為目的的經學，順理成章地發生於經典時代終結之後。對於中國歷史上經典時代的持續時期，我認為至少應從堯舜時代算起，因為按照儒家傳統的看法，這一時代確立了中國理想政治的典範。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就是將複現堯舜之治作為畢生追求的目標。

中國文明史上，繼起於經典時代的軸心時代乃是以對經書的創造性詮釋作為根本特徵。軸心時代在中國歷史上約當於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產生了一批開宗立派的思想文化宗師，其中道家有老子、莊子；儒家有孔子、孟子。其他如墨家、法家、名家、兵家、農家、陰陽家等也都紛紛面世，並且一無例外都是人才輩出，群星閃爍。這一時期的文化創造無論是自深度，還是從廣度上都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奠定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正是居於這一成就，雅斯貝爾斯將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納入其所謂世界文明歷史的軸心時代範疇中。不過，他顯然沒有注意到中國的軸心時代與其它民族例如古希臘的軸心時代並不一樣。它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豐富創造性乃是通過詮釋傳統而實現的。之所以如此，正如上文所述乃是因為在中國的軸心時代之前還存在一個經典時代，而這在其它文明例如古希臘是不存在的。古希臘自然在軸心時代之前也有它的古老史詩《伊利亞特》、《奧德賽》，因此有時人們又稱這一時代為史詩時代。然而，古希臘的史詩並不具有經的地位，對以後古希臘文明的發展之影響也無法與中國的五經相提並論。論及於此，也許有人會提出疑問：中國軸心時代中出現的儒家、墨家二支固然具有很強的述而不作的特徵，孔子、墨子均以推闡先王之道作為畢生追求的第一目標，然而道家、農家、法家、兵家、名家等其它諸家思想家，在發展他們的學說時並沒有先王之道的影子伴隨著，他們各自的思想體系應該具有獨創性。這一疑問表面看來頗為深刻，實際上卻是因為對先王之道缺乏整全的認識。誠然，上述

諸家較少從正面談論先王之道，然而它們其實並沒有完全脫離這一主題。道家、法家都從不同的角度批評先王之道，道家思想家通過對先王之道的批判來復興他們自己心目中的古道，此即將先王之道進一步追溯至更為古遠的伏羲、神農時代。而法家則轉而提出法後王，至於其他各專門的思想流派也都莫不力圖推闡其先王之道的一端來確立本派的宗旨。因此先王之道並非僅歸屬於儒家，而是包括道家在內的諸子百諸家之共同歸依。

《莊子》就認為諸子百家都是發源于先王之道，只不過是各自執其一端以立說。不過《莊子》將這種現象描述為道之滅裂與分化。其《天下篇》對之有很精彩的概述，其雲：“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通，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而司馬遷則認為諸子百家是殊途同歸，《史記·太史公自序》說：“《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這都是以為諸子百家僅得古代道術之一端，是整全道術滅裂、分化之後的產物，而在這之前是存在一個渾全的道的。很顯然，諸子都採取向源初道的回溯來闡發各自的思想。思想的生成就是在對“原初”的這種反復的更新再始的運動中實現的。

## 2、中國文化以現世關懷為中心

從文化體系比較的角度看，中國文明總體上是一種以現世主義為導向的禮樂文明。依據經典時代留存的經典文獻，這一文化體系在“前三代”即堯、舜、禹就已定型，而在“後三代”即夏、商、周時期則臻於成熟。孔子的“鬱鬱乎文哉！吾從周”的感歎就是表述對西周禮樂文明的嚮往。儒家也正是因為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禮樂精神，才使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而道家則在究明天道，體察天人關係方面成績顯著。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鳴，百家競起，實際上都是對禮樂文化進行批評、反思，而沒有就這一文化的根基予以質疑。因而我們可以說，百家的論爭只是在同一文化體系範圍內部的爭論，無論是道家對儒家的批評，還是墨家與儒家的爭衡，都只是在同一價值體系中展開的，而沒有從根本結構上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所突破。直到隨著後漢之後佛教的傳入，以及由之引發的三教論爭，乃使中國傳統文化直接面臨著另一成熟文化——印度文化的挑戰。由於印度文化具有濃厚的出世主義色彩，這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其主體文化儒家文化來說相當陌生。因此佛教宣傳的三世輪回、因果報應、緣起性空、涅槃寂滅等觀念在當時對中國人引起極大的震動。因為以禮樂文化為特色的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關注現實人生、關注此世生活。這無疑具有其特別的優勢。不過與周邊其它文化相比，它的弱點也是很明顯的，其中尤可注目者就是它的精神視域相對狹窄，其對生存的理解具有平

面化的傾向。相對地道家對此有所糾偏，它也關注對形而上問題特別是對生命超越論的探討，不過由於道家追求的超越徑路更多的一種內在超越，因而只有少數社會精英才能理解，而無法滿足普通大眾對終極存在的精神信仰需求。因此道家也仍然難以扭轉中國文化過於強調現世的整體傾向。

## 二、儒、釋、道三教與中華思想的三元一體之特點

美國學者亨林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對冷戰之後出現的世界各種力量對比新格局進行反思，提出一種理解今後世界歷史發展的新的思路。他淡化了過去那種或以種族的、或以意識形態、或以地域的諸形態作為標示符號的觀點，而只講各大文明之間的競爭和交鋒。他認為冷戰時代結束之後，中國的儒家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等文明之間將展開生存發展的競爭。未來世界歷史將圍繞此一主線而展開。該著作對文化的研究跨越了過去盛行的單從民族的傳承和國家載體的狹隘視野。這種獨特的視角不但對於我們把握今後世界歷史的走向具有相當的啟發意義，而且也有助於理解過去世界文明史所呈現的諸種複雜格局。實際上，如果我們從宗教——這一文明的核心載體的創立與流布看，伴隨著世界上幾大主要宗教例如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創立及由發源地向四周的流布，世界文明史的走向也隨之呈現激烈變動。兩者之間的正相關性是極其明顯的。例如當西元前六世紀佛教創立以後，隨著其不斷向中亞、東南亞的傳播，尤其是西元前後伴隨大乘佛教進入中國，直至隋唐時期，中國完成其佛教中國化歷程為止，印度文明因之達到其輝煌的頂點。舊大陸中，除歐州的古希臘、羅馬世界外，世界各主要文明民族都呈現出全面印度化的特徵。這種歷史在其後伴隨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創立及流布，又不斷得到重演。因此從人類文明的諸種構成因素看，種族的、國家的、地理的、軍事的、經濟的等因素都不如宗教因素對文明的影響來得大。毫無疑問，亨林頓所提出的中心觀點是建立在此前西方歷史學家斯賓格勒、湯因比等人對世界文明區域劃分的基礎之上。但是，倘若我們想用這一思路為主線來解釋既往世界文明史，還需要對亨林頓書中的觀點加以進一步推闡。此外，亨林頓單純以儒家文明來指代中華文明顯然也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的文明實際上是以儒家為表顯的三教合一的綜合文明，正是這一點使它有別於其他文明，而凸顯出中國文明的包容性與豐富性。眾所周知，中國文明是與儒、釋、道等三支為基幹支撐起來的，他們共同構築起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系統。儒釋道三教各有擅長，他們互相補充，長期以來對傳統社會廣泛滲透，對中國古代歷史同時產生深刻影響。南宋孝宗曾說，中國文明是以佛教治心、以道教養生、以儒教治國。這句話恰當的指出了三支文化力量在中國所佔有的位置。如果說世界上其它幾種主要文明象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只是一種單一宗教文明(在這一點上，印度文明似乎是個例外，它儘管與印度教為基幹，但同時其它宗教象耆那教、錫克教、伊斯蘭教等，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中華文明就是以儒、釋、道互補為基本特徵的複合結

構。三足鼎立，其支撐更牢固。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解釋中國古代社會為什麼具有超強的穩定性及延續性的原因所在。

此外，與現存世界上其它主要文明相比，中國文明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特徵，此即以此世的、人文的關懷為中心。這與其它文明奠基於神性中心形成鮮明比照。從中國文明發展的歷史看，中國文明的這一特色可以溯及其發軔之根源，而尤與軸心時代對傳統的詮釋路向息息相關。從文化體系比較的角度看，中國文明總體上是一種以現世主義為導向的禮樂文明。依據經典時代留存的經典文獻，這一文化體系在“前三代”即堯、舜、禹就已定型，而在“後三代”即夏、商、周時期則臻於成熟。孔子的“鬱鬱乎文哉！吾從周”的感歎就是表述對西周禮樂文明的嚮往。儒家也正是因為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禮樂精神，才使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而道家則在究明天道、體察天人關係方面成績顯著。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爭鳴、百家競起，實際上都是對禮樂文化進行批評、反思，而沒有就這一文化的根基予以質疑。因而我們可以說，百家的論爭只是在同一文化體系範圍內部的爭論，無論是道家對儒家的批評，還是墨家與儒家的爭衡，都只是在同一價值體系中展開的，而沒有從根本結構上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所突破。直到隨著後漢之後佛教的傳入，以及由之引發的三教論爭，乃使中國傳統文化直接面臨著另一成熟文化——印度文化的挑戰。由於印度文化具有濃厚的出世主義色彩，這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其主體文化儒家文化來說相當陌生。因此佛教宣傳的三世輪回、因果報應、緣起性空、涅槃寂滅等觀念在當時對中國人引起極大的震動。因為以禮樂文化為特色的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關注現實人生、關注此世生活。這無疑具有其特別的優勢。不過與周邊其它文化相比，它的弱點也是很明顯的，其中尤可注目者就是它的精神視域相對狹窄，其對生存的理解具有平面化的傾向。相對地道家對此有所糾偏，它也關注對形而上問題特別是對生命超越論的探討，不過由於道家追求的超越徑路更多的一種內在超越，因而只有少數社會精英才能理解，而無法滿足普通大眾對終極存在的精神信仰需求。因此道家也仍然難以扭轉中國文化過於強調現世的整體傾向。此外，中國文化的缺點還表現其主幹儒家文化，乃是奠基於以宗法血緣為核心的推擴式文化，儘管它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世界關懷，例如大同思想、仁愛精神等，但其實現的途徑乃是依據血緣關係，遵循由近至遠的推擴性進路，這與佛教的大悲精神、基督教的博愛這種強調價值關懷普適性的宗教文化精神相比，無疑具有一定狹隘性與排它性，像儒家根深蒂固的華夷之辨及與之密切關聯的華夏文化中心論就是明顯的代表。而這又直接影響到中華文明由中心地區向邊遠地區的傳佈。

### 三、中華文化對中國歷史的支撐——關於中國歷史上的兩次“全盤西化論”

祖國統一、民族團結最重要在於文化認同。近年有學者提出“文化中國”就是要宣

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曾經經歷幾個重要的歷史發展階段：這是由春秋戰國以前的華夏族到秦漢時期形成的漢民族，以及今天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在這一發展過程中，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壯大，其生存地域也隨之擴大。然而我們也要看到，在歷史上中華民族也曾歷經坎坷，其主體民族多次被遊牧民族征服，典型者例如元、清。我們民族的統一歷史也曾數次中斷，由統一轉向分裂。但中華民族卻並未在分裂中解體，而是在每次分裂之後迎來一次更為波瀾壯闊的統一，中華民族正是通過這種累次並購重組的形式不斷壯大。這在世界文明史中也是一個奇跡。那麼創造這一歷史奇跡的主要原因何在呢？我認為還要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構造中去找。

眾所周知，世界幾大文明古國中只有中國與印度是一體延續，綿延不斷，直至今日。而與印度相較，中國又有統一時間更長、主體民族穩定等特點。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中國獨特的儒、釋、道三教互補互融的三元一體的穩定文化結構是重要基石。這在歷史上表現很明顯，每當異民族以武力在政治、軍事上征服中國之後，最終卻在文化上為主體民族的文化所征服。中國傳統文化就好比一個吸納器，它能將歷史中各種異質文化吸納、包容在一起，並最終搏聚鑄就成一個文化統一體。中國文化對中華文明生命力的這種持續支撐就是文化做為軟實力的最好詮釋。因為從軍事實力上看，中國歷史上中原王朝並不總是處於強勢，由於中國北部毗鄰廣大草原遊牧部落活動區域，這就決定奠基於黃河、長江兩河流域農業區的中原王朝長期受到來自北方草原民族的軍事壓力。又由於農業文明的軍事力量的機動性相對於草原遊牧民族，天然處於劣勢地位。這就造成了歷史上中原王朝的發展進程經常由於北方草原遊牧民族的侵襲而被中斷，從而陷入政治解體、政權分裂的狀態。典型者如東晉南北朝時期、宋遼金元時期，中原統一王朝都是因為來自北方(包括西北、東北)勢力的衝擊，從而陷入政權解體的狀態。然而，與世界上其它古老文明解體後再也不能重建的結局不同，令人驚訝的是，每次中國的統一政權解體之後，經過或長或短的分裂對峙，最終都能釀造成一個規模更大政權統一體。在這新的統一體中，無論是主體民族還是其生存空間，都大大地得以拓展。中華民族及所棲居的地理空間就是通過這一獨特方式不斷發展起來的。至於為什麼中華文明及創造這一文明的民族——中華民族能在不斷解體之後實現重建，我認為其內在原因不在其軍事優勢(實際上軍事方面中原王朝並不具備優勢)，也不在其政治、經濟優勢，因為這些方面世界其它解體的古代文明也曾經擁有。而在於其擁有的獨特文化構造，這就是以儒、釋、道互補為核心的三元一體的穩定文化構造。事實上，中國歷史上每次草原民族對中原王朝的征服，都無法擊破這一三元一體的文化結構，反而帶上自身獨特文化因素連同其民族、土地一同歸依中原主體文化，從而為中華文明不斷發展壯大做出自己的獨特貢獻。從這點看，草原民族對中原王朝的征服並非是中國歷史發展的負面因素，相反倒可看成一次更大發展的蓄勢。那種把中國歷史上分裂時代看成黑暗時代的觀點，乃是不懂得陰



陽相生的歷史原則。因此我們說中華文明之所以能綿延幾千年而不中斷的奧秘就在於其三元一體的穩定文化結構。三足鼎立，既有分別又互相支撐。這種獨特文化結構在世界其它文明中極為罕見。

與世界上其它主要奠基於神性中心的單一文化系統例如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等不同，中華文明實際上是以儒家為表顯的三教合一的綜合文明，正是這一點使它有別于其他文明，而凸顯出中國文明的包容性。中國文明是與儒、釋、道等三支為基幹支撐起來的，他們共同構築起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系統。儒釋道三教各有擅長，他們互相補充，長期以來對傳統社會廣泛滲透，對中國古代歷史同時產生深刻影響。南宋孝宗在《原道辯》曾說，中國文化是以佛教治心，以道教治身，以儒教治世。<sup>2</sup>這句話恰當的指出了三支文化力量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所佔有的位置。在這三支文化力量中，儒家文化對於維持社會穩定及發展發揮主導性作用，而道家特別是其無為而治、以質化文的返本歸根式的思想觀念，則對於王朝的重建及休息生息，發揮不可替代作用。至於佛教以其開張三世，貫通幽冥的高超生命境界，無疑對中國人平衡其過於執著於現世的心靈，有著清醒劑的作用。如果說世界上其它幾種主要文明象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只是一種單一宗教文明，相比之下中華文明就是以儒釋道互補為基本特徵的複合結構。三足鼎立，其支撐更牢固。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解釋：中國古代社會為何具有如此超強的穩定性，中國的歷史又為何能延續五千年而不中斷等，這一世界歷史中極為罕見的歷史現象。

從中華文化發展的歷史看，中國文化以儒、釋、道三教為主體的三元一體互補結構的形成，乃是通過與世界上其它文明的交鋒，吸收其它文明價值系統之所長而形成的。這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首先是通過對印度文明的融合，改造吸收印度文明的載體——佛教的思想觀念而達成的。因此，從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我們說中國傳統文化又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具有很高的學習、更生能力。又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中國文化才能不斷克服自身的弱點，吸收外來文化的長處，同時又不喪失自身的文化認同，才使得她不斷走向成熟，從而延續自己的慧命。從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過程看，也曾遭遇異文化系統的挑戰。我們注意到從文化發展角度看，中國歷史上在中外文化上曾經歷兩次全盤西化的過程，其中最早一次全盤西化就是印化即印度化。對此，現代很多人對於這段文化歷史都已相當陌生，我們不妨來回顧一下。眾所周知，中國文化是一種以現世主義為導向的禮樂文化。依據現存經典文獻諸如《尚書》、《易經》、《詩經》及三禮的載述，這一文化體系在“前三代”即堯、舜、禹就已定型，而在“後三代”即夏、商、周時期則臻於成熟。孔子的“鬱鬱乎文哉！吾從周”的感歎就是表述對西周禮樂文化的嚮往。儒家正是因為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禮樂精神，才使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春秋、戰國

---

<sup>2</sup> 劉謐《三教平心論》卷上

時期諸子百鳴，百家競起，實際上都是對禮樂文化進行批評、反思，而沒有就這一文化的根基予以質疑。因而我們可以說，百家的論爭只是在同一文化體系範圍內部的爭論，無論是道家對儒家的批評，還是墨家與儒家的爭衡，都只是在同一價值體系中展開的，而沒有從根本結構上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所突破。隨著後漢之後佛教的傳入，以及由之引發的三教論爭，乃使中國傳統文化直接面臨著另一成熟文化——印度文化的挑戰。由於印度文化具有濃厚的出世主義色彩，這對中國文化來說相當陌生。因此佛教宣傳的三世輪回、因果報應、緣起性空、涅槃寂滅等觀念在當時對中國人引起極大的震動。以禮樂文化為特色的中國文化關注現實人生、關注此世生活。這無疑具有其特別的優勢。不過與周邊其它文化特別是印度相比，它的弱點也是很明顯的，其中尤可注目者就是它的精神視域相對狹窄，其對生存的理解具有平面化的傾向。不少論者都指出在中國文化中對來世學的探討相當薄弱，著名日本印度學者中村元認為中國人沒有實踐深刻的宗教反省，孔子的學說中欠缺諸如“原罪”、“拯救”等觀念，而這在印度和西方宗教中都是基本觀念。<sup>3</sup>關於中國文化這一弱點，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三教論爭中，就有不少論者予以指出。例如東晉高僧慧遠就說：

原其所由，由世典以一生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為關鍵者也。<sup>4</sup>

這就很明確指出中國文化討論範圍局限於此生，而對此生之外則未涉及。劉宋僧人慧琳在名著《白黑論》中，引時人的觀點於比較佛教與周、孔之教之優劣時，更是予以充分展開，其云：

周孔為教，正及一世，不見來生無窮之緣。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效止於榮祿，誅責極於窮賤。視聽之外，冥然不知，良可悲矣。釋迦闢無窮之業，拔重關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群生不足勝其化。敘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不覃。

5

這是以佛教的天堂、地獄、報應、泥洹、法身等具有出世主義色彩的觀念對中土周孔學說進行批評。由於這些高僧本來對中國本土文化就很精通，因此他們的批評確實切中中國文化弱點。的確無論是儒家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還是道家《莊子》的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中國文化整體來說是一種現世中心導向的文化。難怪當他們碰到以

<sup>3</sup> 中村元指出：“在印度與中世紀歐洲一樣，生活于現世是為了更好的來世作準備的思想非常強烈。然而在中國，這種思想並不常常抬頭，在這方面或許可以說，中國人沒有實踐深刻的宗教上的反省，那就是說，中國人沒有很深的罪障意識。人們常常指出，在孔子的教說中沒有“原罪”或“拯救”的觀念。”《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第172頁，中村元著，林太、馬小鶴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

<sup>4</sup> 《三報論》第103，《弘明集》卷五，中華書局2011年1月

<sup>5</sup> 《白黑論》，《宋書》卷97《天竺迦毗黎傳》

佛教為代表的印度文化開張三世，究極幽冥，超邁生滅，體證涅槃等顯示立體多維的思想視域時，則精神為之震撼。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對中、印文化之優劣進行分判時，這一時期的不少崇佛者都稱釋迦牟尼為“眾聖之王，四生之首”、<sup>6</sup>為“大聖”<sup>7</sup>。而對中土文化進行貶抑。這種獨崇佛教、貶抑儒、道的態度在佞佛皇帝梁武帝身上達到頂峰。他在《敕舍道事佛》一文中，竟然將中國傳統的儒、道二教都斥為邪教，並號召臣下反偽就真，舍邪歸正：

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為化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隔凡成聖。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偽就真，舍邪歸正。<sup>8</sup>

考慮到在當時普遍將印度稱為西方、西土，因此蕭衍這種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態度，似乎可以視為中國歷史上最早一種全盤西化、印化的主張。這對長期以來習慣于“夷夏之辨”，執持華夏文化優越論的中國士大夫不啻晴天霹靂，其引發的震撼也許只有鴉片戰爭時期由於泰西文化的大規模傳入對中國文化造成挑戰，差可比擬。

從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看，這次由佛教傳入為契機而引發的中、印文化交鋒，乃是中國文化首次遭遇另一高度發展的、成熟文化體系的挑戰。由於佛教宣傳的基本教義諸如因果報應、六道輪回、涅槃解脫、三世相續等等，都為中國傳統思想較少觸及或者展述不充分。因此，在這場長達八百年之久的中、印文化衝撞中，我們看到華夏文化中心意識第一次受到質疑。當然我們更看到通過三教論爭，中國本土文化並未解體從而喪失其自身認同，反而是通過爭論，士大夫對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特點把握得更為充分、明晰。佛教也正是因為能平衡中國文化中過於強勢的現世主義而得到精英階層的追捧，並被接納到中國文化中，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之一。就中國文化來看，佛教及其所承載的印度思想的傳入，大大拓展了中國文化的精神視域，提高了中國思想的思維抽象能力，彌補了中國文化現世主義導向過於強烈的俗世主義弊端。

此外，從世界文明的大視野看，作為世界兩大古老文明的中、印文明在歷史上的衝突、交鋒及其所採取的解決途徑，為當今全球化時代解決各文明之間的衝突提供了借鑒意義。

中國文化經歷的第二次全盤西化就是我們現在正親歷的中、西文化衝突。當前我們正處於多元文明並存、競爭的全球化時代，以科技文明為主要特徵的西方文明正全方位

<sup>6</sup>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廣弘明集》卷一 62-943

<sup>7</sup> 《歸正篇序》，《廣弘明集》卷一，52冊 97-98

<sup>8</sup> 《廣弘明集》卷四

影響、衝擊中華古老文明，這是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中華文明第二次遭遇另一異質的、高度發展文明的挑戰。我們注意到中、西文明的正式文鋒，如果從晚明算起的話，迄今已持續四百多年，而且這一過程仍未終止。這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佛教傳入為契機引發的長達八百年以上的中、印文明交鋒相比，其規模、影響度以及時間跨度都差可比肩。我們也看到在這次中、西文化衝突中，也曾出現五四時期發出的對中國傳統文化全面質疑的聲音，諸如"打倒孔家店"式的全盤西化口號，與第一次全盤印化時期梁武帝斥周孔之教為邪教何其相似。我們也驚喜看到自那以後，中國文化在經歷低谷之後，並未完全解體，相反地我們今天在吸納西方文化的科技、政制等諸多優勢之後，中國文化再次以其博大的包容姿態主動迎接挑戰，從而不斷面向時代，走向更為輝煌的未來。